

# 西咸研究

(增刊·第5期)

西咸研究院

2019年4月17日

---

## 本期导读:

- 1、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释放新一轮扩大开放的五大信号
- 2、韩正：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加快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
- 3、楼继伟：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8个挑战
- 4、刘世锦：中国下一步有五大增长来源
- 5、李扬：“一带一路”推崇发展优先

#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释放新一轮扩大开放的五大信号

3月23日至25日，全国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经济论坛——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今年的主题为“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中国在论坛上释放了新一轮扩大开放的信号。

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金融等领域正在酝酿一批新的更高水平的开放措施；中国正制定《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规章，推动更多批次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

中国将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此将更注重“边境后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国还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推动多个FTA谈判，并积极参与WTO改革。

## 信号一：缩减负面清单，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24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韩正强调，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已经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韩正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持续放宽外商投资准入，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记者，中

国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建立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渐进式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13 年率先在自贸试验区试行，2017 年推广到全国。去年清单已从 63 项缩减至 48 项，接下来仍有进一步缩减的空间。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论坛上表示，今年将进一步缩减这一清单，清单之外的领域，一律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不再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论坛上透露，中国将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设立生产研发基地。未来将推动一批规模较大、示范性较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

“去年和今年已经有两批正在落地，今年还将推出第三批，甚至更多批。”

据悉，国家发改委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重大外资项目服务和推进工作，目前，已推出沈阳华晨宝马、上海特斯拉、西安三星闪存芯片等两批重大外资项目。而宁吉喆在全国两会期间介绍，第三批主要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石化、电子信息等领域，将给予用地、用海、用能、规划等支持。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为 1350 亿美元，增长 3%；而合同外资 5000 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近 1700 个，同比增长了 23.3%。

## **信号二：扩大金融业开放，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宁吉喆表示，中国将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制造业方面，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中国将全面放开一

般制造业，全面推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华投资和开展业务。

服务业中，金融业开放是一大焦点。央行行长易纲直言，扩大金融业开放势在必行。去年央行宣布了金融开放时间表，对 11 项具体措施给出了具体时间。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

他指出，下一步将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要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

易纲表示，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论坛上透露，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在准入方面，正在研究取消或放宽银行业保险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数量性条件限制，包括规模限制、年限限制、股东类型限制、持股比例限制等。

此外，将进一步拓展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并给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创新试点提供一些新领域。不断建设更具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兼容监管体系。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标准，中国资本项目已具有较高的可兑换程度。下一步资本项目开放将着力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

的开放，提高可汇兑项目的便利化程度，提高交易环节对外开放程度。

### 信号三：推动 FTA 谈判，妥善解决中美经贸摩擦

钱克明表示，新一轮开放要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我们将着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在去年底的商务工作会议上，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告诉记者，经过 16 年努力，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25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 17 个自贸协定。

“从贸易量上看，中国 FTA 的贸易占我们对外贸易的 38%，即使不含港澳台地区，这一比例也达到了 25%。我们将与更多的主要贸易伙伴建立自贸区。”他介绍，中国目前在同 28 个国家和地区商谈 13 个新的 FTA。

中美经贸关系是论坛讨论的一个焦点。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指出，中美当务之急是要跨越两个陷阱，即所谓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休昔底德陷阱，以及世界秩序、世界治理失去领导力的金戈尔伯格陷阱。

他指出，中美未必一定会陷入上述陷阱，因为中美关系是在共同的政治经济秩序下形成的，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以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为三大支柱的经济制度中，中美都是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美国前贸易代表、万事达卡副董事长迈克尔·弗罗曼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既是危机也有可能成为机会，正在进行的

贸易谈判中结构性问题可能是一个难点。

他指出，此前的中美 BIT 谈判可能会提供一个好的基础，“此前 BIT 谈判差不多达成了 95%，里面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国企补贴等很多结构性问题，其实中国一直在内部调整，希望能达成共识；现在大家都希望能继续延续双边投资协议的基础来谈判。”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指出，对于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的反应明显过激，她非常担忧这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内社会，影响到美国自己的开放程度，她认为，美国应在保证国家安全与维持社会开放中保持平衡。

朱光耀建议，考虑建立两国元首的定期会晤机制，同时，充分发挥中美两国现有的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和中美两国现有的省州城市友好合作机制的作用。

#### **信号四：降低关税，积极参与 WTO 改革**

韩正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积极主动扩大进口，进一步降低关税，加快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让世界各国更好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

白明表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的约束关税为 10%，截至 2010 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履行完毕，关税由 2001 年的 15.3% 降至 9.8%。去年中国三次主动降低进口关税，中国关税总水平已降至 7.5%。

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5 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 4.4%，明显低于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接近美国（2.4%）、欧盟（3%）和澳大利亚（4%）的水平。

钱克明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年前中方提出了世贸组织改革的三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并与欧洲等成员递交了 WTO 改革提案。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指出，当前 WTO 正面临很多困难，从内部看，成员之间谈判进展缓慢，补贴等方面的规则迟迟未能达成；外部更面临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攻击，这带来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瘫痪等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讲。”

拉米认为，世贸组织必须做好两套计划：计划 A 是把美国放在其中，由中美欧日等各方推动对 WTO 进行改革；计划 B 是如果特朗普彻底破坏 WTO 的话，世贸组织必须考虑一个没有美国的 WTO 是什么样的。

#### **信号五：更注重“边境后开放”，开放措施法定化**

中国正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钱克明指出，制度型开放是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和公平的开放。近 60 年来，各国通过降低关税等“边境上”的壁垒，推动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但现在推动消减“边境壁垒”的边际收益已经很小。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一些前沿领域，正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

他表示，过去，中国推动开放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边境上的准入壁垒，今后的开放要向边境后延伸，更加注重完善国内规则、制度、法律体系，强化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让

开放在消除边境后壁垒、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发挥更大作用。

白明表示，制度型开放一方面更强调与国际的接轨，另一方面更侧重于法律、制度等层面的常态化开放，强调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近期，《外商投资法》已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这部法律确立了中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钱克明表示，下一步将对现行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不相符的法律进行清理；对大量涉及外商投资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定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更加细化的配套法规规章。

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中国将加快修改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以法定规范的方式将对外开放的举措固定下来。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处罚等。

宁吉喆表示，未来中国将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对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开放式创新至关重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在论坛上透露，中国正在修订专利法、著作权法，在这些修订草案中，都设置了故意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提高了法定赔偿上限；今年将把商标审查周期压减5个月以内，专利审查周期压减15%以上。

韩文秀强调，要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和决心，加强统筹

谋划，以解决结构性议题为契机，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水平开放带动结构性改革，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 **韩正：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加快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时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进一步降低关税，降低通关难度。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中国还要加快电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开放进程。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创新。

韩正说，中国将更好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吸引保护外商投资。禁止强制外商投资者转让技术，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建立惩罚侵权制度，提高政策透明度、可预期性，尊重国际惯例，对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让外资企业实现更好发展。

他表示，全国的负面清单和自贸区的清单越来越接近，今年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全国进一步推广，中国还将对全国的负面清单和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压缩。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 **楼继伟：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 8 个挑战**

3 月 22 日，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在京举行，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做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本单元的主题是《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阶段的挑战和战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题目，我只想围绕中国在这一阶段面临的挑战和战略谈一些看法。

去年，中国的人均 GDP 刚刚超过 9700 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 1.26 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经相距不远。当然，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再翻番，还比较遥远。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前后是风险高发期，我是简单的说一下 1998 年开始的 20 年。

1998 年中国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偏下阶段，这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两次的外部冲击，我们都较好地予以应对，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我们通过 1994 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实现了向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跨越，1996 年实现了人民币经济项下可兑换，为适应 WTO 的规则要求我们用数年时间清理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法律和管理办法，等到外部冲击来临时，我们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制度发挥作用，人口结构良好，红利充分释放，直接投资大量涌入。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亚洲各国陷入危机，资本纷纷都到中国来，人民币坚持稳定，政策也是对头的。当时逆周期的总需求应对，扩张性的产业政策持续地改善了基础设施，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得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出现了高就业、低物价、快增长的良好局面。

在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重要的原因有：中国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不同群体的获益差别很大。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还没有有效发挥作用，历史原因使得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初中，以及人口和土地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等等。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总体上是恰当的，政策的重点从需求管理进一步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例如，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已经遍及城乡，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加速推进城镇化，加大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力度，在减税政策中突出对创新的支持，持续推动解除管制方面的改革，比如注册企业市场准入许可、投资审批周期等指标都大幅度提升。

从 2008 年到 2018 年这十年，中国在世行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提高了 43 位，达到了 46 位。在这一时期，同前十年相比，老龄化的步伐加快，人力资本提高加快，更加重视环保，企业的成本上升很快。一方面，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加速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境内的创新力度加大。中国经济以更高的水平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总的来看，就业充分、物价平稳、增长率有所降低，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并发挥作用，基尼系数在较高水平上企稳。

在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前十年不显著或者关注不足的挑战在本期愈加显现，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应对这些挑战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劳伦斯·萨默斯刚才讲到了，如果一直有比较良好的政策，无论是处于中等收入还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增长都可以持续，当然增长的速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别需要在高增长阶段之后进行政策转型。世锦刚才也点到这一点，技术给出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我听他刚才讲的，这时候政策转型是难的。

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我是主席，我们这次中国方面主动提出得到大家的共识，就是把结构性改革作为我们年度推进的主题。当时容克主席讲到一点对我很有触动，我们都知道结构性改革应该做什么，唯一不知道的是我们做了之后还在不在那里——就是当利益集团，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是全社会利益都触动的时候这个改革就积重难返了。

我们中国高层领导讲到，我们现在从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时候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最重要的，不要陶醉，到了利益障碍变成全社会的时候，就会出现欧盟主席容克讲的那个局面。

现在有哪些挑战呢？我给大家讲讲有八个方面的挑战，我观察到的。

### **1、高杠杆率的挑战。**

无论是宏观的杠杆率还是各分类杠杆率都偏高，必须有序地降杠杆，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严肃财政纪律，在降杠杆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与之相关的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防止大起大落。

相比而言，我国基本是国内杠杆，外债规模不高，国际收支平衡。与一些拉美国家不同，这有利于我们增加信心，增强降杠杆进度的自主性，例子太多了，我点一点就可以了，不展开。

## **2、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科创企业融资的挑战。**

这些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挑战，都是短板，不仅是我国，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个情况。

我国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范发展 VC/PE 基金，创设科创板、改善证券市场监管，并对资本市场加大了外资准入力度，提出了自由化的时间表，中国央行也借鉴欧央行的经验，创设了一些结构性工具，支持这些小微企业。

总之，中国以适宜的政策、有效的监管，改革和扩大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挑战。

## **3、消除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的挑战。**

在减贫方面，中国作出了巨大努力，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大部分份额。现在剩下的是绝对贫困对象，脱贫难度是最大的。治理污染有还欠帐的因素，粗放式忽略环境成本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两方面靠政策也要靠改革，结合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农民工进城落户，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有利于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合适的公共服务，这里也有利益的冲击，我也不展开。结合城市旧街区的改造，改善环境，既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又能提供具有规模效应的能源和市政服务，这些工作正在加快进行，有较强的再分配的效果和环境改善的效应。

#### 4、现阶段信息复杂性快速提高，对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带来挑战。

消费的形态、产业的形态、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日益多样化。在发展的早期，政府通过强指向性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到现在效果越来越差。中国政策在持续解除管制、减税降费，放手让企业应对信息复杂性问题，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从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逐步转变，其实是看到了原来的方式效果越来越差，但是有一个探索过程。

其实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不少好的做法可以借鉴，德国提出 2.0、4.0，我看他一些政策其实是有点普惠化功能性的。美国是信息高速公路，早期是曼哈顿计划，中期的某些产业政策等，我们都可以借鉴。

#### 5、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契约精神不足的挑战。

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契约精神不足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具有经济人行为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这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行政运动式的推动工作，负作用就是产权保护和契约精神不足。

信息复杂性快速提升，越来越需要企业在竞争中推动经济增长。在推动结构升级的现阶段，政府要退出竞争，转向保护产权、保护契约，给企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

近十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和改进相当大，如设立巡回法庭、处理跨区域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创设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加大科技创新保护力度，服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营造法制化的保护环境等等。

## 6、防止腐败蔓延的挑战。

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后，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还未成型，极易造成腐败蔓延的态势，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义，缺乏增长动力，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首先是反腐败没有禁区，所谓打虎拍蝇；另一方面是建立长效机制，解除管制，简政放权，大幅度压缩了寻租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对所有的公权力机构实行任期巡视制度，建立国家监察委，并从司法体系改革相结合，提升法官的职业化水平，增强审判独立性，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 7、泛福利化导致竞争力缺乏，经济不可持续，最终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挑战。

这种情景在一些拉美国家和个别东南亚国家都可以观察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比较稳健，没有实施大面积的价格补贴，随着老龄化加快，现有社会保险体系的碎片化、不可持续性显现。

对此，从去年开始已启动全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程，

开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当然，建立起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险体系还要付出艰巨的改革努力。

## 8、融入全球化的开放战略受逆全球化思潮冲击的挑战。

这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需要共同努力应对。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全面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模范的履行世贸组织各项规则，高质量地履行节能减排责任。

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基本要求，体现出在进一步开放中遵守共同准则的鲜明态度。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食品、服装到家电、汽车、飞机等数百种商品都是单一最大市场，任何国家都不会忽视，中国是产业链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传统劳动密集产业正在向较低收入国家转移，以农产品多元化为主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中西部地区兴起，制造业和新兴业态正在快速升级并吸纳和延伸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

挑起贸易摩擦对中国不利，对发起国不利，排除中国的国际经贸规则安排是做不到的，各国都有不能承受之重。刚才劳伦斯·萨默斯讲了，现在不是大而不能倒，是大而脱不了。各国都有不能承受之重。同时，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一再表明，中国是接受国际规则的，因为这些规则绝大多数是同我们改革的要求相一致的。

以上8个方面的挑战，将阶段性的或者持续性的在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前后出现，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将不断创造出发展的机遇。

我要强调一点，刚才所列举的应对措施并不全面，但绝不仅是我认为应当做的，而是我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在做并宣誓持续做下去的事实，正在实现和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挑战。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 刘世锦：中国下一步有五大增长来源

3 月 22 日，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在京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开幕致辞上提出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对中国下一步发展很重要，刘世锦直言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还没有搞清楚，希望各方能够深入讨论。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过去八年一直在减速，为什么减速？

“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这个问题应该说困惑争论了八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共识，有一些解释，比如主要是外部性或者周期性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很难解释的”，刘世锦指出。

刘世锦的团队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增长阶段在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是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和可以利用的技术减少，一些重要需求历史峰值的出现，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相关。

刘世锦指出，讨论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中国现在讲

稳增长，到底要稳什么样的增长，我们是不是要或者能不能回到过去那种高增长的轨道？另外，对宏观政策的期待是什么，有些人期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放松，能不能解决潜在增长率变化的问题，是否能把速度拉倒过去高增长的轨道？

第二个问题，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或者主要的挑战。这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第一节讨论的话题。

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进入不了高收入社会，都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从中国来讲，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感觉到中国下一步有五个大的增长来源，第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第二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第三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四是前沿性创新，第五是绿色发展”，刘世锦指出。

刘世锦也直言，这些增长来源都面临着很多障碍，面临体制和政策的障碍，要能够发挥出来都不容易。现在会遇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和老体制相关的利益难以打破、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城乡之间的要素难以自由流动等。

第三个问题，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是否具有对冲功能。

刘世锦指出，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的特点，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优点。

具体而言，像中国某些产品的市场周期避免了一种过度的排浪式的冲击，市场的销售周期长一点。

再比如，转型成功的地区与不大成功的地区之间形成对冲，这对于较小规模的经济体而言是不大可能的。最近几年，东北地区比较困难，面临企业缺少竞争力、人口流出等问题；但在东南沿海地区，像深圳这些地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在中国国内形成一个对冲。

刘世锦表示，中国总体上转型的状况其实还不错。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吸收冲击、缩小差距，为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机会。中国过去讨论比较多的是东西差距，最近讨论的是南北差距问题，比如最近几年东北一些省份，和所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上的那些国家有没有相似性？

第四个问题，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短板是什么。

中国早些年发展，主要把外来现金技术应用到本土。最近一些年，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不大，在部分领域并跑甚至领跑。此外，中国还有市场规模大，容易形成商业模式、产业配套齐全等等优势。

刘世锦团队提供的研究报告《新发展理念指数的国际比较》指出，中国在创新这个指标上，国际比较上仍然是相对落后的，主要是中国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依然比较少。

“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差距依然很大，而要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短板如果补不上，中国的创新很可能是缺乏后劲的”，刘世锦表示。

第五个问题，中国现在继续对外开放，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意义何在？

当前单边主义回潮，全球化遭遇曲折，中国仍然坚持并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两会刚刚通过的《对外商投资法》，表明中国准备以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来营造投资环境。不仅如此，国内对民营经济的讨论也多，要致力于创造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

“下一步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增长的重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引进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是互惠的行为，我们看到很多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还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内部性问题，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紧密度比较接近时甚至相等的时候，其实一个国家和外部的经济联系就成为一个更大范围，或者说全球性的内部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中美两个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从长期来看，我们对全球化的前景还是要有信心。”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 李扬：“一带一路”推崇发展优先

3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以“坚持扩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上做主旨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讨论世界经济的危机问题，有一个话题是绕不开的，就是全球化前景了。今天我结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观察。

首先我们知道去全球化是确认无疑的事实，这个图明显显示出这一点。典型事实是说贸易增长低于 GDP 增长，有几组数据证明。到 2005 年的时候，贸易增长 6.6，GDP 是 3.5。2008 年的时候，贸易增长 3.4，GDP 是 2.4。2011 年基本保持在同样的水平。2013 年到 2016 年，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 GDP 的增长水平。去全球化所有值得担忧有很多的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说贸易增长速度放慢的话，资本品的增长会更慢。而贸易增长率下降会导致贸易形成量下降，拖累经济增长。所以这个图非常清楚显示出这样一个贸易增长率低于 GDP 增长率的恶果，这就是去全球化最简单的途径。

是不是要去全球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之后，准确说不是要去全球化，而是传统意义的全球化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在世界上各国正在通过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再平衡来积极探讨全球化的新理念，新的范式 and 新的路径。也就是不能简单认为是去全球化，首先是说过去的全球化有问题了，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一个新的全球化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传统全球化是什么意思，本质是什么？其实本质就是发达经济体将国内体制、机制、规则、最佳实践意识形态甚至文化的全球化。而且，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行推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传统全球化的推进过程呈现出很强烈的规则优先的显著特点。那么依据规则来进行全球化，这应当说

没有什么错误。但问题是，如果在强调规则的时候，不注意这些规则在其他国家可否落户，如果不注意这些规则在其他国家实施之后，会不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好处。这样一个规则优先是有缺陷的，现在大家挑战的是这种意义的规则优先。

我们说去全球化，大家都说美国是始作俑者，是急先锋。我们看奥巴马政府一系列的表态确实是去全球化的，但是基本的趋向是另辟蹊径，重塑全球化的格局。从而，在这样一个新格局中，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无论是 TPP，还是 TTIP 都是这样的努力，这个大家都有多很的研究。其实特朗普政府依然继承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思路。他说的是美国优先，我们注意分析，在这样一个大旗帜下，他关于全球化强调了三点：

第一，全球化是有成本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过去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美国承担，现在不愿意承担了，需要伙伴欧盟承担，需要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来承担全球化的成本，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第二，过去的全球化是多边协议，现在他说双边。凡是多边都废除，重新谈，哪怕内容和多边的内容是一样的，也要一对一重新谈。在这个谈的过程中美国是占优的。

第三，有一些产生比较大作用的国际框架下。比如说推动 WTO 的全面改革，在阿根廷会议上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很明确的表示。

这样一些全球化的结果已经看到了，全世界分成三六九等，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分为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分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地位不一样，发达国家基于高端，

在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其他国家的位置相对不那么有利。所以我们很清楚感受到很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

我们转到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要有一大堆的产能过剩向要走，而是要推进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方略。首先我们看到“一带一路”要做的事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看到“一带一路”串联的是穷国，过去的全球化下，这些穷国是被边缘化的，并没有在全球化的体系中，或者说进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但是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体系，“一带一路”要让他们进入全球体系，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真正的各个国家都会进入全球化的浪潮。

第二，和规则优先不同，发展优先。那么“一带一路”致力于推进参与国家的产能合作。因此，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劳动大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帮助国内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一带一路”的几点和规则不太一样。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很多的成功做法，比如说金融方面的做法，小企业的做法，一些特区的做法，都是能够直接借鉴的。

第三，“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如果说传统的全球化追求是趋同，脑子里想大家都变成一样，都变成美国。那么“一带一路”说的不是这样，承认差别，承认多元，我们要做的是共建、共商、共享。我们各国因地制宜，寻求符合自己的发展方法。致力于整个的发展战略和本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求合作共赢。应当说“一带一路”提出几年到现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可以说主要任务是机制化。让

“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机制。

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内容。比如说，进一步深化合作。比如说要与现在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对接的问题，包括和WTO，和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对接。利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一带一路”的参与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机制的协调。在“一带一路”的参与下，我们要规避搭便车的行为，规避道德风险。

当然，我们在“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倡议下，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另外建立可持续性的投资融资机制，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目前，这就是在全球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些新情况，我们相信“一带一路”会成为解救危机的一个有效方法，它会和整个世界相协调，让世界渡过危机。

（来源：腾讯财经）

---

送：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